

洪秀全：上帝的中國兒子

● 夏春濤

Jonathan D. Spence,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96).

可以這麼說，不了解太平天國宗教，也就無法真正認識太平天國的歷史。令人遺憾的是，在現有的研究成果中，並無一部以宗教為主線探討太平天國興亡史的專著。史景遷教授的新著則在這一方面作了有益的嘗試。

發生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農民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向為中外史家所重視。本世紀50、60年代，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學術界對太平天國史的研究曾達到一個高潮，出版了一批重要論著；太平天國和美國內戰、法國大革命都曾是歷史專業博士論文的熱門選題。但此後，該研究便日趨冷落。最近，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的新著《上帝的中國兒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面世，終於打破了這一沉寂，故而格外令人注目。

上帝神話與天國的興亡

太平天國運動有着其時代和自身的特點。與以往的農民戰爭相比，它雖然依舊以宗教形式起事，但它採用的並非是篝火狐鳴、符瑞圖讖之類的傳統套路，而是一種中西合璧的宗教，其源頭來自西方基督教。宗教與太平天國的盛衰始終息息相關。可以這麼說，不了解太平天國宗教，也就無法真正認識太平天國的歷史。令人遺憾的是，在現有的研究成果中，並無一部以宗教為主線探討太平天國興亡史的專著。史景遷教授的新著則在這一方面作了有益的嘗試。

在該書的〈序言〉中，作者開宗明義地寫道：「本書無意描述太平天國運動完整的歷史，……相反，我主要關注洪秀全的心靈，試圖盡可能地理解這位不同尋常的人物何以能夠在如此漫長的歲月中對他的國家產生如此令人震驚的影響。」①

基於這種構思，從宗教入手解釋洪秀全的心路歷程，進而探索其思想嬗變和太平天國興亡的軌迹，便成為該書的主旨，也成為該書的主要特色之一。

洪秀全是在鴉片戰爭前夜列強加緊對華進行滲透的背景下接觸到西方基督教的，以往的論著在分析太平天國運動興起的背景時，對這方面的情形着墨不多。在該書前兩章，史氏首先揭示了在洪秀全接觸洋教之前，廣東地區出現的微妙變局：當時，洋商居住在廣州十三行內，儘管受到種種禁令約束，但仍與華人社會有着較多的接觸。其時，在珠江岸邊停泊着各種各樣的船隻，洋人也常坐渡船到對岸的河南（一江中大洲）去消遣。人們操着洋涇浜英語與洋人打交道，其中有洋行的華商，也有攤販、藝人、醫卜星相、工匠、苦力、妓女等。美國傳教醫師帕克（P. Parker）設在十三行的診所更是門庭若市，1835年11月至1836年2月間，計有925名患者來此受診，年齡從6歲到78歲不等，其中女性佔了三分之一。不過，西方人仍不免為困守中國一隅而倍感焦慮，傳教士們更是急不可待，曾數度私自在沿海一帶佈道。史氏指出，中國民眾對此的反應總體上較為淡漠，不少人之所以接近傳教士，主要是出於好奇，或是為了向其索要看病的藥丸甚至鴉片，而不是出於精神上的需要。但傳統的「夷夏之防」觀念畢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接着，史氏又講述了梁發受洗入教、撰寫《勸世良言》並廣為散發等情形。通過這一番描述，史氏不僅使讀者感受到了廣東

地區當時獨特的社會氛圍，還為洪秀全日後獲贈《勸世良言》等情節埋下了伏筆，章節之間的過渡銜接得十分自然，可謂別開生面。

在後面的章節中，史氏又將讀者帶進了一個神秘、峰迴路轉的世界。在史氏的筆下，我們進入了洪秀全在精神恍惚的狀態下所作的升天異夢，領略了上帝對世間罪人所施的種種天罰，感受到了洪秀全等人雲遊佈道時的僕僕風塵，以及揭幟造反的會眾從四面八方雲集金田的壯觀場面。在層層鋪敘的同時，史氏還就一些重要史事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洪秀全何時獲贈《勸世良言》？贈書人是誰？學術界對此向有爭論，至今仍有學者持1833年說，認為贈書者即作者梁發。史氏經過考證，斷言洪氏獲書時間為1836年，授書人為美國傳教士史第芬（Edwin Stevens）（第3章）。對於洪秀全早期思想的發展變化，史氏也有着較為準確的把握。有一種說法認為，洪氏在1843年讀罷《勸世良言》後改奉上帝，從此便走上了反清道路。史氏則認為，直至1849年左右，由於拜上帝會信徒屢遭官府和當地鄉紳的迫害，洪秀全等才正式開始密謀反清（第9章）。

早在太平天國時期，西方朝野人士無論對太平天國抱何種態度，均一致認為這場運動是《聖經》啟示的結果，視太平軍為「太平基督徒」；西方學術界也一直有人認為太平天國宗教等同於基督教或屬於它的某一教派。史氏摒棄了這種成見，強調了太平天國宗教中的中國民間宗教成分，即根據當地巫術

有一種說法認為，洪秀全在1843年讀罷《勸世良言》後改奉上帝，從此便走上了反清道路。但史景遷則認為，直至1849年左右，由於拜上帝會信徒屢遭官府和當地鄉紳的迫害，洪秀全等才正式開始密謀反清。

以往研究太平天國史的著述大多偏重於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在框架上雷同重複，較少突破。本書則從社會史的角度，結合有關史事對相應的社會層面進行剖析，從而豐富了人們對太平天國史的認識。

衍生出的天父、天兄分別降托楊秀清、蕭朝貴下凡的形式(第8章)；另突出了它與西方基督教在教義上的歧異，詳細論述了洪秀全刪改、批注《聖經》的內容(第17章、21章)。與1854年7月太平天國中出版《聖經》是起因於洪、楊之爭的說法相反，作者認為其導火線為八天前楊秀清與英國來使以信函往返形式所展開的宗教辯論。在這場衝突中，英人援引《聖經》，逐一反駁了太平天國的教義，使得後者終於意識到《聖經》對其教義所構成的威脅。楊秀清遂以天父上帝下凡的名義宣布《聖經》錯訛甚多，下令停止出版(第15章)；後由洪秀全親自完成了修訂《聖經》的工作。這種分析是令人信服的。

該書的寫作風格也別具特色，不僅敘述生動，而且切入的角度也頗有創意，題為〈降雪〉的第21章即為一例。1862年初，上海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寒冷氣候，大雪自1月26日起連降了58小時，地面積雪厚達30多英寸；大雪過後，嚴寒又持續了好幾個星期，氣溫急劇下降，導致大雪封途，河流凍結。這一細節以前從未引起學者們的重視。該章以此為引，記述了忠王李秀成部二攻上海時的情景，使人對太平軍此役失利的客觀原因有了更為全面的了解，並且讀來引人入勝。「降雪」的另一層含義則隱指太平天國此時所面臨的形勢。天京事變後，太平天國元氣大傷；天父下凡活動也因楊秀清身首異處而降下了帷幕，這對上帝神話而言無疑是一個莫大的嘲諷。因此，在後期的征戰中，太平軍士氣低落，人心

離散，與前期形同隔世。對此，作者意味深長地寫道：「在那些遙遠的日子裏，上帝下凡是多麼地頻繁！而現在，上帝卻緘默不言了。」^②

本書約有30餘萬言。作者在有限的篇幅內，以宗教為主線，對太平天國史作了鳥瞰式的描述，從洪秀全最初在西南邊陲的崇山峻嶺間雲遊佈道，以上帝旗幟號召無數信徒揭竿而起，一直寫到天京被湘軍攻陷，上帝神話連同天堂之夢在烈火與煙焰中化作灰燼，絲絲入扣，詳略得當，表現了作者駕馭、詮釋史料的能力和編排、剪輯歷史事件的熟練技巧。

社會史的視野

以往研究太平天國史的著述汗牛充棟，其中不乏高質量的論著，但大多偏重於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在框架上雷同重複，較少突破。本書的另一特色是並沒有單純地就太平天國論太平天國，而是從社會史的角度，結合有關史事對相應的社會層面進行剖析，從而豐富了人們對太平天國史的認識，給人以清新之感。全書此類情節甚多，茲擇例略加評介。

該書第21章以太平軍攻打上海為背景，對戰亂時期的江南社會作了一個全景式素描，其中對上海一地的描述最為引人注目。當時，八種不同類型的武裝包括洋槍隊、槍匪、地方團練等在上海四周活躍着。值此風聲鶴唳、謠言四起之際，四鄉的農民紛紛逃往上海，饑

饑和疾病的威脅日甚一日。與此同時，各國的浪人、懶漢和逃兵也紛紛擠在來華的船隻中湧進上海。租界警方的日誌中滿是這些被列為「難民」或「流浪者」的犯罪記錄，諸如偷竊中國攤販的食物或物品，強姦中國和西方婦女，綁架兒童，等等。謀殺事件也時有發生，凶手肇事後往往逃到黃浦江對岸的浦東，以躲避懲罰。而警察卻辦案不力，酗酒瀆職，甚至與罪犯串通一氣，從中提取佣金。最令租界領事頭痛的是那些私下與太平軍做軍火生意的案件。當時，軍火物資充斥了整個上海城。部分軍火是從香港甚至新加坡長途販運而來。也有一些歐洲人竟堂而皇之地在浦東設局製造武器，然後再用船隻偷運到太平天國境內。這些軍火走私將火藥註明是「中國鼻煙」，雷管則以「捲煙」或「宗教手冊」的名義裝上船，來福槍則標明是「雨傘」。軍火倒賣的規模有時大得令人咋舌，如一家美國公司於1862年4月賣給太平軍一批武器，其清單上計列有2,783支滑膛槍，66支半自動步槍，4支來福槍，895門野戰炮，484個火藥桶，10,947磅火藥，18,000發子彈，3,113,500根雷管。史氏還指出，太平軍在天京城內也擁有一些能工巧匠，據云其自行製造的槍炮遠遠優於清方所製造的槍炮。此外，太平軍還在作戰中繳獲了大量西式武器。通過上述途徑，後期太平軍的裝備大為改善。

中國早期的近代化首先是從軍隊近代化開始的。無論是太平天國還是清政府，均通過沙場廝殺意識到了西方堅船利炮的先進性和重要

性，並組織人力、物力進行仿造。清方尤其規模，正式建立了新式軍用企業。在這個過程中，外國僱傭軍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清方僱傭軍主要有人們所熟知的常勝軍、常捷軍等，但有關太平軍一方僱傭軍的研究，至今仍幾乎是個空白。該書第16章、22章則對之有所探討。據史氏考證，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便開始有外國人陸續來投。其中，在鎮江軍營中效力的意大利人安東尼(Antonie)膂力過人，作戰驍勇。他被特許不受太平軍禁令的約束，可以吸食鴉片和飲烈性酒。同在鎮江的另有五名馬尼拉人，均留髮易服，並一同參加太平軍的宗教儀式。愛爾蘭人肯能(Canny)在被東王召見時，回答了有關歐洲人如何打仗的詢問，並用手槍作了射擊表演。英國人納里斯(P. Nellis)則率領一群歐洲人參加了1864年的湖州戰役，並受到干王洪仁玕的接見。干王用英語詢問其國籍，納里斯作答後，在天朝外交事務中屢受洋人欺騙的干王不禁憤憤然表示：「他從未遇到過一位品行良好的外國人。」^③

在太平天國領導層中，總理後期朝政的洪仁玕以倡導新政著稱。他的新政思想主要基於他早年流亡香港期間對世界大勢的了解，以及對西方政教設施的考察和認識，這是學術界的共識。但關於香港當時的社會狀況和洪仁玕在香港時的經歷，現有的論著大多語焉不詳。該書第19章則對此作了較為詳細的考察。1852年左右是香港早期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其時，太平軍和天地會在兩廣地區異常活躍，內地的

當時，最令租界領事頭痛的是那些私下與太平軍做軍火生意的案件。這些軍火走私將火藥註明是「中國鼻煙」，雷管則以「捲煙」或「宗教手冊」的名義裝上船，來福槍則標明是「雨傘」。軍火倒賣的規模有時大得令人咋舌。

1852年左右，由於太平軍和天地會在兩廣地區異常活躍，內地的富紳大戶被迫紛紛遷至香港，給香港注入了活力。史氏評述道：「這塊彈丸之地的殖民地本身展現了西方和中國最好和最壞的一面，以及兩種文化在某種程度上的融合。」

富紳大戶被迫紛紛遷至香港，導致香港的房屋一時供不應求，房價上揚。過去較為冷清的街道也隨之變得熙熙攘攘，熱鬧非凡。新的華人商會相繼成立，從而刺激了當地經濟的發展。由香港皇家工程師規劃的道路、下水道和港口設施陸續建成；另種植了成片的灌木和竹林，以調節空氣。上述變化，連同漂亮的郵局、新建的教堂和房屋，給香港注入了活力。史氏評述道：「這塊彈丸之地的殖民地本身展現了西方和中國最好和最壞的一面，以及兩種文化在某種程度上的融合。」^④在經濟日趨發展的同時，這裏又充斥着暴力和污穢，諸如非法的鴉片貿易，血腥的苦力交易，敵對幫會之間的火拼，利用下水道躲過地面守衛的歹徒們的劫掠，隨處可見的妓院、賭博，等等。自1852年起斷續在港盤桓約五年之久的洪仁玕，正是這段歷史的見證人。當時，他主要受僱於倫敦佈道會香港分會，在擔任佈道師期間結識了不少傳教士，與理雅各 (J. Legge) 牧師的交往尤為密切。理雅各對洪仁玕頗有好感，並說後者是唯一一位與他在散步時互相摟着對方脖子的中國人。儘管如此，理雅各仍不時在洪仁玕面前露出殖民主義的傲慢心態。1857年夏天的一個下午，理雅各正沿着海濱散步，恰逢英國特命全權大使額爾金 (Elgin) 勳爵的坐艦駛進港灣，一陣震耳欲聾的禮炮聲在山脊間引起久久的回盪，理雅各竟對同伴說道：「這是中國往昔的哀鳴。她沒有任何辦法來對付這些龐然大物。」^⑤同年，洪仁玕還耳濡目染了該埠早期較為複雜的一個

案件——華人麪飽坊在麪飽裏施毒泄憤，導致不少洋人中毒——的審理過程。史氏的研究對我們了解洪仁玕後來提出近代化綱領《資政新篇》的背景和動機很有幫助。

史氏收入的八幅插圖也為該書添色不少。內有四幅收藏於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描繪僧格林沁圍堵太平天國北伐軍戰事，分別以連鎮等地攻守、俘獲太平軍北伐統帥林鳳祥為題；另外四幅為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描繪湘軍戰事，分別以岳州戰役、通城戰役、克服武昌和俘獲幼主洪天貴福為題。中國大陸的學者迄今尚無人利用過這些畫。它們雖是當時的畫師奉官方的旨意繪製，難免有誇張、渲染的成分，但仍不失其史料價值。

結束語

太平天國史研究在中國大陸已持續了大半個世紀，期間名家輩出，著述如林。但隨着研究難度的加大和學者們研究興趣的轉移，目前有關研究已趨於冷落。然而此項研究實際上並未窮盡，仍有待進一步的探討。史景遷教授以其獨特的視角，進行了一種別開生面的研究，勾勒出一幅新穎生動的太平天國史畫卷，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益的啟示。該書徵引的大量西人原始著述，也為我們進一步挖掘、利用外文資料提供了有利的線索。

與以往的西方論著相比，作者並沒有簡單地將太平天國運動定義為「叛亂」，而是較為客觀地描述了

這段歷史，這實屬難能可貴。不過，該書似乎多少仍帶有些「西方中心論」的色彩。作者在〈前言〉中坦言：「我相信，洪秀全的異夢多少是由西方人及其基督教給中國所帶來的諸多變化的重迭的層面所構成的。」^①作者對促使洪秀全皈依上帝乃至率眾造反的內在的社會政治原因雖有論述，但着力不夠。毋庸諱言，西方傳教士當時所熱衷的傳教事業遠非僅僅局限於向崇拜偶像的中國民眾傳播「福音」的文化意義，他們當中有不少人直接或間接地效命於本國政府在華的殖民擴張事務，揭開了以十字架和炮艦聯合征服中國的歷史。就此而言，基督教的確是中國人民的精神鴉片。至於這種起麻醉作用的鴉片之所以能在洪秀全那裏變成興奮劑，閱讀《勸世良言》和夢境中的幻覺僅是一種誘因，科場的連番失意、日益蓄積的對現實社會的強烈不滿才是導致他投入上帝懷抱的主要原因。等到洪秀全立下了推翻清朝、創建天國的宏願後，他又對其異夢中的幻覺作了有意識的政治附會。

正如書名所示，該書的體例實際上介於洪秀全傳記和太平天國通史之間。受體例和篇幅的限制，作者對某些問題未能作進一步的探究。例如，太平天國敗亡後，洪秀全及其手創的宗教究竟對後世中國社會產生了何種影響？這可能是讀者很想探詢的問題。由於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衝突過於激烈，太平天國宗教在傳播的過程中遇到了四民階層尤其是士大夫的強烈抵制，始終

未能在民間立足。因此，太平天國覆亡後，其宗教便隨之被歲月所湮沒，在中國大地上幾乎沒有留下一絲痕迹。相反，基於太平天國宗教與基督教同源現象，時人籠統地將兩者視為一體。於是，基督教除了暗傷王化、用夷變夏外，又多了一個煽動「叛亂」的罪名，這就在客觀上為民間反洋教運動的興起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洪秀全之所以被辛亥革命時期的仁人志士推崇，並不是因為他是「上帝的中國兒子」，而是因為他曾經領導了一場狂飆運動。孫中山先生自命為「洪秀全第二」的寓意也即在此。

洪秀全之所以被辛亥革命時期的仁人志士推崇，並不是因為他是「上帝的中國兒子」，而是因為他曾經領導了一場狂飆運動。孫中山先生自命為「洪秀全第二」的寓意也即在此。

註釋

①②③④⑤⑥ Jonathan D. Spence,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96), xxvi; 315; 329; 272; 271; xxvi.

夏春濤 1963年生於江蘇揚州，1991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著有《太平天國宗教》、《清代全史》第七卷（合著），另發表論文多篇。